

《西方将主宰多久》续篇

颠覆历史研究的惯常思维：文明可用数据来度量

从上万年的历史角度探寻东西方世界文明繁盛的根源

解决“大历史”观的问题：文明何以兴起？又何以衰落

震撼性的研究成果：未来世界的文明将由东方还是西方主导

文明的度量

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美] 伊恩·莫里斯 (Ian Morris) 著
李阳 译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中信出版社 CHINA XINHUA PRESS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文明的度量
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美] 伊恩·莫里斯 (Ian Morris) ◎著
李阳◎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 (美) 莫里斯著；李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6
书名原文：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ISBN 978-7-5086-4494-3

I. 文… II. ①莫… ②李… III. 东西文化-文化史-研究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49555 号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by Ian Morris

Copyright © 2013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著 者：[美] 伊恩·莫里斯

译 者：李 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19 千字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3-71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494-3/K·374

定 价：5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第一章 |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

- 为何西方主宰了世界 3
- 什么是社会发展 6
- 进化、分化、能量：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8
- 批评与缺点：谁犯了错 18
 - 分化 18
 - 复杂性 19
 - 进化 19
 - 进步 20
 - 阶段理论 21
 - 社会 22
 - 量化 23
- 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24

第二章 | 跨越时空的度量：社会发展指数

- 定量、东西方、时间：什么支撑着社会发展指数 27
 - 定量分析 28
 - 简约性 28
 - 特性 29
 - 有用特性的标准 30
 - 关注东方和西方，而不是整个世界 30
 - 哪儿是东方，哪儿是西方 32
 - 度量的时间间隔 34

关注核心地带	35
近似和讹误	38
社会发展是可以计算的	38
250分还是0.01分：哪个社会更发达	41
反对者的声音	43
通吃：展示历史的轮廓	47

第三章 |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

东方、西方从哪儿出发	54
度量的单位	58
证据的本质	58
中断与增长：西方能量获取	60
不远的过去(1700~2000年)	62
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前200年）	65
古代和现代之间（200~1700年）	79
冰期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约公元前14000年）	87
惊人的积累：西方能量获取	103
后来者居上：东方能量获取	107
最近的过去（1800~2000年）	110
中国宋朝（960~1279年）	114
现代早期的中国（1300~1700年）	117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公元前200~公元200年）	120
证据不足的800年（公元200~1000年）	123
冰期晚期和后冰期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约公元前14000~前9500年）	126
从采集者到帝国主义者（公元前9500~前200年）	127
采集者和农民（公元前9500~前2500年）	129
古代国家（约公元前2500~前800年）	131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00~前200年）	134
计算分数	135
无法突破的“硬天花板”	138

第四章 |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

- 办法、假设和来源 143
- 从穆赖拜特到纽约 145
- 从姜寨到东京 154
- 多少人才够 165
 - 间接度量 165
 - 能量获取失去对城市规模的影响 166
 - 城市规模的量级 171

第五章 |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

- 量化战争能力 175
- 西方是军事霸主吗 179
 - 20世纪的变革 179
 - 1500~1800年欧洲的军事革命 185
 - 从恺撒到苏莱曼（公元1~1500年） 189
 - 早年的战争（公元前3000~前1年） 194
- 难以评估的东方 197
 - 2000年东西方的军事平衡 197
 - 东方的现代军事革命（1850~2000年） 200
 - 火药时代的东方战争能力（公元1500~1850年） 202
 - 中华帝国和游牧时代（公元前200~公元1500年） 205
 - 中国早期（公元前1600~前200年） 211
- 工业革命改造枪炮 213

第六章 | 信息技术：它影响了社会

- 读、写和计算 219
- 信息技术记分牌 221
- 西方识字率 230

东方识字率 232
信息技术的反馈回路 235

第七章 | 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义

误差和讹误 240
指数的直观显示 250
物质与文化的角力 254
直线发展和多线发展的进化 259
社会进化的方向 261

致谢 265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



为何西方主宰了世界



大约 250 年前，西欧的知识分子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问题本身并不算坏：西方似乎主宰着世界，却不知道何以如此。18 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解释千差万别，不过最流行的几种观点都认为：自远古时代起，西方就形成了一些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西方终有一天要成为世界霸主。

直到 21 世纪初，这样的观点仍然有市场，只是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与 18 世纪的如出一辙，是认为欧洲人继承了某种独特而先进的文化传统。这种西方文明的根源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过也有人认为，史前印欧人、古日耳曼人，或者说中世纪的欧洲人，才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者。

在 18 世纪，还有一股思潮认为，正是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欧洲人比其他种族精力更充沛、创造力更强。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大量支持者。一些学者将生态论和文化论结合起来，提出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将现代化初期的欧洲推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甚至连欧洲人在生理上优于其他种族的观点，也在改头换面后仍为一些人所坚持：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自 13 世纪以来，自然选择使得欧

洲人比其他任何人种都更节俭、更勤劳；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古人类学家认为，自一万年前农业起源以来，遗传进化方面的差异使得欧洲人及其后代比其他人种更具活力、更善于发明创造。

这些理论全都成形于 18 世纪，当时欧洲财富暴涨和实力激增的现象迫切需要得到解释。直到 20 世纪晚期，在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暴涨现象后，这些理论才遭遇严峻挑战。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跃居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用长期的文化、环境或种族因素来解释西方成功的理论，肯定是不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世界历史的重头戏并非西方长期而不可阻拦的崛起，而是多极世界的形成，西方只是在近代暂时甚至可能是偶然占据了优势。

这些新理论甚至比旧的长期注定论的争议还要大。其中一些最为极端的观点认为 18 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认识恰好是本末倒置的。按照这些新理论，实际上中国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全球占据领先优势，只是一系列怪异的偶然事件才使得天平短暂地向欧洲倾斜。然而，绝大多数理论观点完全反对进行长期分析，认为复杂的亚洲社会和欧洲社会是沿着平行的轨道发展的，直到 18 世纪，甚至 19 世纪，由于双方在国家结构、先天条件、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或者思想潮流方面的细小差异，才使欧洲获得了统治地位。

关于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后果的争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不同理论的支持者似乎经常是在各说各话。他们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关键术语，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并采用不同的举证标准。结果，观点不同者很难就他们试图说明什么达成一致，更不用提如何说明。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称之为“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智力等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的能力。新版本的 18 世纪理论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认为，西方的社会发展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就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了。他们的批评者则倾向于认为，西方只是在六七代人之前才脱颖而出的。如果真想解释西方称霸的原因，就需要衡量社会发展，对其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我们只有在建立了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模式

后，才能着手分析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演进的。

定量分析并不一定使争论更加客观，但的确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争论各方讲清楚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阐明他们为什么要赋予这些差异不同的数值。任何不同意某位学者观点的人，都可以关注其证据和用于计算分值的方法，而不是交换含混不清、道理不足的概括总结。与社会发展概念类似的数值指数，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政策制定等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完善，而且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中，也有一个这样尺度鲜明的模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历史学家也开始将类似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统计数据来解决大问题。其经典的案例也许当属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时间》（*Time on the Cross*）。该书汇集了数千份种植园档案中的数据，分析出19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究竟怎样有利可图，以及奴隶们又有怎样的亲身经历。

《十字架上的时间》为计量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该书共有两卷，第一卷是较宽泛的概述，既针对专业学者，也面向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第二卷则详尽地展现了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统计技术和对统计资料的运用。

《文明的度量》将遵循这一模式。本书是我此前的书《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在我写那本书时，编辑和我决定将其支撑材料放到一个网站上，而不是再出一本纸质书，但自那时起，情形就越来越明显，有些人希望得到这些材料的纸质版本，并希望材料更为广泛并得到修订。

我写《文明的度量》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想给批评《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炮弹”。他们需要这些“炮弹”来对我在该书中得出的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尽管我当然希望我的论述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但如果我本人的分析能引发清晰的争论，最终得到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指数，并对西方实力和财富的崛起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也是不错的结果。

第二个目的是想为比较史学变得更加清楚、更可量化做出贡献。由生物学家转为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适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想问的所有问题的数值指数，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较史学成为这样一门成熟学科的最好办法之一，也许就是精心设计出多重指标，使每项指标都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本书起首处，我要开宗明义地对我在提及“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时头脑所想的，做出正式定义。继而，我要对为做出这个定义所吸收的观点，以及最近 50 年来针对这些观点的异议，逐一综述。在第二章中，我试图从这些批评中提炼出社会发展指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然后解释我是如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我列举了我所取得的成果所依据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这是社会发展指数的 4 大特性。在最后一章，我思考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争论，社会发展指数有可能做出贡献的一些方式。

什么是社会发展



我所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我要给这一特性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是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曾提出，将这一概念称为“社会力量”也许更好，但不能令我信服，尤其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以前曾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定义的那种——极其不同，这个用词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西方（这是又一个需要定义的重要概念，在

第二章有详细的说明)在过去 200 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达到了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的水平;(2)这种水平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

也许我们应当将“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称作社会发展的最小定义。这样很便利,但却不够精确,而且像所有最小定义一样,其外延抽象化程度很高,使之很难用于操作(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立刻将这样含糊的一种说法付诸使用)。

因此,社会科学家们通常会在最小定义后续之以一个“理想型”定义。这种理想型定义“旨在汇集众多最大属性,也就是囊括所有(非特有的)有助于以其最纯粹、最理想(或许也是其最极端)的形式定义该概念的特性”。

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企图。”

从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是我们可以衡量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的事物。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远古时代起就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答案一定深藏在历史中,正如西方生态和环境优越论的持有者们所主张的那样。然而,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是在公元前 1000 年后开始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我们也许就要断定:主张希腊、罗马重要性的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事实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越其他文明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旧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必须另寻解释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衡量,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解释。社会发展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需要解释的模式。

社会发展也不是衡量不同社会的价值的标尺。例如,21 世纪的日本,遍布着配有空调、实现了计算机化的工厂和繁华的城市,到处是汽车和飞机、图书馆和博物馆,拥有高科技的医疗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当今的日本人对自己

然环境和知识环境的利用远比他们 1 000 年前的祖先要充分。1 000 年前的日本，上述事物一概没有。因此，要说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水平比中世纪的日本要高，是完全成立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代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同样，社会发展得分高低与道德、环境及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毫无关系。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

进化、分化、能量：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学者们对类似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一直饶有兴趣。对于这一历史观点，已有若干出色的评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做全面概括了。我将只关注看上去与本书中将构建的社会发展指数最为相关的观点，然后介绍一些对这些方法最为重要的批评。

最有助益的起点也许当属那位古怪的英国大学问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 1857 年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上的《论进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s and Cause*）了。像 19 世纪中叶的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斯宾塞也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先前难以想象的进步时代，并想对此做出解释。他认为：“从科学所能探及的最遥远的过去，到新奇事物层出不穷的昨天，进步最本质的成分，是从相同性质转化为不同性质。”他提议将事物从起初简单到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机制称为“进化”：

事物经过持续分化的过程，从简单发展到复杂，可以看出在我们所能推论的宇宙的最早变化中，在我们能够通过归纳而确定的最早变化中，是相似的。这种发展可以从地球在地质和气候上的演变中看出；可以从地球表面每个单个的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的种类增长中看出；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看出，无论是关注文明的个体还是各种族整体；可以从社会的演变中看出，就其政治、宗教、

经济组织的变化而言；可以从所有那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人类活动的产物的演变中看出，正是这些无穷无尽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

在接下去的 40 年内，斯宾塞将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归拢成一个涵盖一切事物的单一的进化理论，来解释宇宙是怎样从简单而无差别变得复杂而千差万别的。在其三卷本《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 中，斯宾塞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 4 个演变阶段，从简单阶段（没有领袖的游荡营居群），经过复合阶段（有政治领袖的稳定村落）和加倍复合阶段（有教会、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学术活动的群体），到三倍复合阶段（像罗马，当然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伟大的文明）。

斯宾塞的观点赢得了大量读者，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很多人都认可了他的理论，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思维，我将使用“社会进化论”这个术语，作为我本章将要讨论的所有理论流派的广泛的标签。我也将把“社会进化”（英国喜用的术语）和“文化进化”（美国喜用的术语）视为同义词。

到 1870 年时，斯宾塞已然成了用英语写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当 19 世纪晚期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需要了解西方的成功经验时，斯宾塞的著作也是他们的首选之一。甚至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 的前五版中并未使用“进化”一词的达尔文，在 1872 年修订第六版时，也不得不向斯宾塞借用了这个词。

还有几位 19 世纪末的理论家（经常和斯宾塞一起被称为“古典进化论者”）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斯宾塞类型学。例如，爱德华·泰勒 (Edward Tylor) 在其《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一书中论述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变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 在他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本书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供这些理论家们利用的考古资料少之又少，因此他们非常倚重于假设。他

们假设 19 世纪定居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其祖先就是在那里居住的，他们的理论阐释了这些已经处于三倍复合阶段（即文明的演变阶段）的民族，一定是自史前时代就在那里定居了。然而，甚至他们所依赖的极其有限的人种学信息都充满了问题。这些信息大多来自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他们所感兴趣的，通常都只是他们所接触的族群的一些非常特别的特征。结果，当 20 世纪初，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独立展开田野调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理论家们所假设的事实，很多完全是错误的。

进入 20 世纪最初 10 年时，一股强烈的反冲发生了，在整个 20 世纪，斯宾塞关于进化和分化应当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观点，仅是昙花一现。其批评者中最重要的是当属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一位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位移居英国的波兰学者）。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时，他们已说服了很多人类学家，使他们相信田野调查的内容包括大量独立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必须理解为一个独特的、无缝的凝聚系统。

功能主义——认为观点、体系和价值会在所有这些独立的文化中达到平衡的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经常会打动人类学家们，使他们认为这是比那些古典进化论者们跳跃式的推测好得多的建设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的基础。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代价之一，无疑是使得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解释变得困难多了，但社会学家们通常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作为科学思维的一项组织原则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很快崩溃了。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仍执着于用进化论来论事，但在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在法西斯国家，尽管相当困难），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将人类群体按照从简单到三倍复合或从野蛮到文明的序列排列，就相当于编造既虚假又无意义的故事。

20 世纪 30 年代也许是博厄斯单一主义的高潮期，但钟摆已开始向回摆动了。考古学家 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又一位移民的学者（这回是从澳大利亚移民到了英国），其学术生涯便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两次世界